

新中國成立之初的選擇



新中國成立初期，對中國走何種發展道路出現了第一次分歧：是停留在新民主主義階段，還是進一步實現社會主義？經過探索，中國共產黨改變了之前設想的先實行十年到十五年的新民主主義，再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方案，而是到 1956 年就基本完成了社會主義改造，確定了以公有制為主，實行計劃經濟、重工業優先發展、農村集體化為主要特徵的經濟制度。

正確認識中國共產黨在這一時期的選擇，是理解中國道路的起點。但如何認識這一變化，在今天仍存在諸多爭議。一些觀點認為，新中國成立初期走上社會主義道路，是出於“意識形態狂熱”、“公有制崇拜”或者照搬蘇聯模式，導致經濟建設走了彎路，“耽誤了二十年”。通過對歷史過程的考察證明，新中國成立初期選擇的經濟發展道路，是具有充分經濟理性和必然性的選擇。只有選擇這樣的道路，才能打破舊中國的小農經濟結構、殖民地經濟結構和弱小的政府能力對經濟發展的限制，開啟現代化的進程。

鴉片戰爭以來，救亡圖存成為中華民族的頭等大事，無數仁人志士前赴後繼，為建立一個獨立、自由、繁榮、昌盛的現代化中國而奮鬥，“把帝國主義者給予我們的創痕與血跡盪滌得乾乾淨淨”，“全國的人，都有飯可食，有衣可穿，有屋可住，有人可愛”，“告別歷史的變亂、踏上新生的道路”。¹這就是八十多年前的“中國夢”。然而，儘管一代代先賢前赴後繼，但中國並沒有登上現代化的列車，反而同世界的差距愈來愈大，中國還是一個典型的農業國、經濟和政治弱國。

1949 年，新中國成立後，中國對現代化道路進入新的求索。代行憲法職能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以下簡稱《共同綱領》）規定了“發展新民主主義的人民經濟，穩步地變農業國為工業國”²的任務。所謂“新民主主義經濟”，是新中國成立之前和成立初期，中國共產黨對未來發展路徑的設想，其主要特點是：由國營經濟主導，各種所有制共同發展。《共同綱領》第二十六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經



濟建設的根本方針，是以公私兼顧、勞資兩利、城鄉互助、內外交流的政策，達到發展生產、繁榮經濟之目的，國家應在經營範圍、原料供給、銷售市場、勞動條件、技術設備、財政政策、金融政策等方面，調劑國營經濟、合作社經濟、農民和手工業者個體經濟、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和國家資本主義經濟，使各種社會經濟成分在國營經濟領導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進整個社會經濟的發展。”¹第三十條還明文規定：“凡有利於國計民生的私營經濟事業，人民政府應鼓勵其經營的積極性，並扶助其發展。”²簡單地說，就是以多種所有制和市場經濟為基礎的“混合經濟”。

也就是說，新中國成立前後，中國共產黨的計劃是先實行十年到十五年新民主主義，再向社會主義過渡。但事實上，以 1956 年基本完成社會主義改造為標誌，新民主主義道路提前結束了，一條新的發展道路逐漸展開了。其主要特徵是：優先發展重工業，而不是勞動密集型的輕工業；確立公有制的絕對主體地位，而沒有形成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的格局；實行計劃經濟，而沒有實行市場經濟；進行農業合作化，而沒有停留在土改之後的家庭所有制上；在國際上實行獨立自主和一定程度的產業保護。

可見，新中國成立初期的經濟發展道路，不同於今天西方經濟學的主張，不同於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實行的市場化、私有制、對外開放道路，不同於改革開放之後的做法，甚至也相同於中國共產黨自己曾經設想並宣佈的新民主主義道路。

新中國為什麼選擇這樣一條道路，其中的道理和邏輯是什麼？今天該如何看待新中國成立初期留下的遺產？這些問題，困擾著今天的許多人，也直接影響著人們對今天全面深化改革過程中重大問題的看法。評價歷史事件，必須從歷史條件出發。正如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中所說，“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但是他們並不能隨心所欲地創造，並不是在他們自己選定的條件下創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承繼下來的條件下創造”。³讓我們回到歷史的情境之中，從新中國成立初期面臨的發展目標和約束條件出發，考察從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轉變是如何發生的。

1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一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1-13。
2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一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1-13。
3 [德]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470。

▶▶▶ 1. 舊中國為什麼沒有能力啟動現代化

中國人民對現代化的追求自清朝末期就開始了，但直到 1949 年，中國還是一個落後的農業國。中國曾經長期是首屈一指的世界強國，19 世紀清朝的國內生產總值（GDP）佔世界的 1/3，明清江南地區已經具備了發達的農業、繁榮的商品經濟、豐富的勞動力和廣闊的市場，可中國為什麼沒有發生工業革命？鴉片戰爭之後，中國逐漸引入了西方的企業、技術、設備甚至一些制度，看上去現代化的一切要素都具備了，為什麼沒有啟動現代化進程？這是因為，舊中國起碼面臨著三個重要的約束，成為中國邁入現代化強國的不可逾越的障礙。

小農經濟的約束

現代化最突出的特徵是工業化，從農業社會進入工業社會至少需要三個條件：一是要有足夠的初始投資和工業技術，因為工業是資本密集型產業；二是農業部門要有足夠的剩餘產品，供養那些脫離農業勞動、專門進行科學研究和工業生產的人；三是有一個較大的高收入群體，他們在基本溫飽需求得到滿足之外，還有能力消費工業產品。總之，工業化能否啟動，首先取決於農業能否為工業部門提供足夠的剩餘產品，而傳統中國社會並沒有滿足這個條件，其根源是人均佔有土地水平很低。

中國是世界上人地關係最為緊張的大國之一。戰國時，人均耕地面積僅有 4.5 畝，清朝中葉下降到 2.0 畝。改革開放初期，鄧小平強調“要使中國實現四個現代化，至少有兩個重要特點是必須看到的：一個是底子薄……第二條是人口多，耕地少”¹。人多地少的國情，成為制約舊中國實現現代化的一大障礙。

首先，人多地少導致農業部門產品有限，難以為工業化提供足夠剩餘。工業化啟動初期，工業部門的資本、原料和勞動力只能來自農村的剩餘，主要的消費市場也是農村。只有在農村具備剩餘產品，並且將剩餘產品集中起來，才能啟動工業



化。中國在封建社會時期，人均佔有成品糧一直不超過三百公斤，特別是清朝中期人口從一億多急劇增加到三億多，人均佔有糧食僅一百七十五公斤，即使糧食分配比較平均，也只能滿足溫飽水平。糧食大部分由農民自己消費，很少進入商品市場，形成了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格局。¹這種人多地少、人多糧少的狀況，決定了不可能給工業化提供足夠的剩餘產品。第一，沒有足夠的剩餘產品來供養大量脫離農業生產的貴族階層，從事科學研究和工業生產（西方工業革命早期從事科學研究的人員，都是貴族出身，像牛頓、伽利略）；第二，不可能長期維持一個高收入階層，有大量剩餘收入去消費工業產品，中國傳統社會積聚財富主要表現為土地集中，而不是消費水平檔次的升級；第三，現代工業發展的動力是用機器代替人力，但是中國人多地少，沒有動力開發代替勞動力的現代技術。因此中國長期停滯在“沒有發展的增長”的超穩定結構。相比來說，歐洲社會一方面人地關係比中國寬鬆得多；另一方面西歐在發現美洲新大陸之後，通過在非洲和美洲的貿易，相當於從海外獲得了大量土地，從而進一步緩解了人地矛盾，為工業革命提供了大量的原料、勞動力和市場，農業可以為工業提供大量剩餘產品和廣闊市場，從那時起，西歐的發展同中國就大相徑庭了。因此，中國現代化必須突破小農經濟對有效集中資源的制約。

其次，在人多地少的制約下，形成了維護低水平公平和穩定的政策和文化。同西歐封建社會的莊園主和農民之間密切的人身依附關係不同，中國封建社會農民和地主之間的人身依附關係並不強，自耕農小土地所有制是一種主要的土地所有制，在傳統中國，“一夫挾五口，治田百畝”²的個體小農是主要的生產單位，維護小農穩定、防止土地兼併，是封建王朝延續統治的前提。一旦工商部門或國家從農村汲取過多資源，就可能導致農村饑荒和破產。一般來說，王朝初期土地分配較為平均，承平日久之後，豪強地主坐大，土地兼併日益嚴重，官僚體系也隨之膨脹，並且和豪強形成利益共同體，這時如果出現有作為的皇帝打擊財富集中，就能實現“中興”。為了維護穩定，封建王朝往往會主動弱化國家能力，輕徭薄賦、減少稅收。秦始皇、漢武帝、隋煬帝等“好大喜功”，集中資源搞基礎建設的行為，在封建社會並不被推崇。這種政策導向，雖然有利於社會安定，但是也限制了商品經濟的進一步

1 龐卓恆：《怎樣尋求世界歷史上先進變落後和落後變先進的根本原因——紀念新中國建立 60 週年》，《世界歷史》，2009（04）。

2 班固：《漢書·食貨志》，北京：中華書局，2012：1032。

1 鄧小平：《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鄧小平文選（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63-164。

發展，難以形成資本集中。進入近代之後，面對工業化的需要，如何做到既集中資本又不危害農村的穩定？這個兩難的問題，清政府和國民黨都沒有有效解決。

再次，小農經濟的生產方式，反過來又影響了農村的社會結構和文化，形成了害怕變革、規避風險、小富即安的文化。各地自給自足，“雞犬之聲相聞，老死不相往來”，不足以產生大量市場交換，也限制了農戶參加社會交往和政治活動的空間。馬克思認為，小農業與家庭手工業相結合的、像馬鈴薯一樣分散的、互相獨立的農村村社，靠著閉關自守的、一家一戶的和自給自足的生活，構成了中國專制制度賴以存在的始終不變的經濟基礎。¹1944年8月31日，毛澤東在給延安《解放日報》報社社長秦邦憲的信中指出：“新民主主義社會的基礎是工廠（社會工廠，公營的與私營的）與合作社（變工隊在內），不是分散的個體經濟。分散的個體經濟——家庭農業與家庭手工業是封建社會的基礎，不是民主社會（舊民主、新民主、社會主義，一概在內）的基礎，這是馬克思主義區別於民粹主義的地方。”²中國小農經濟的這些特點，在封閉的封建社會條件下，有利於長期穩定。但是，一旦受到外部衝擊，就難以應對。近代以來，中國現代化進程屢屢受挫，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一切改良、改革都僅僅著眼於上層和城市，而沒有從根本上改變農村的經濟和社會結構。鴉片戰爭之後，無論外國資本還是中國政府，客觀上都有從農村汲取資源、支持城市工商業發展的強烈要求。這時，傳統農村的“超穩定機制”就被破壞了：工商和金融資本下鄉，對農村形成衝擊，個體小農無法和大資本對抗；土地兼併和高利貸盛行，再加上工商資本的盤剝，大量小農破產，農村形成了兩極分化。農民活不下去，也不可能形成有效的國內市場。而大量的剩餘產品為地主、高利貸者等食利者階層所攫取，也就不可能集中起來進行基礎設施建設，啟動工業化。

新中國成立後，毛澤東多次提起一件事：他十一歲時，二叔毛菊生瀕臨破產，要把僅有的七畝地賣給毛澤東家，毛澤東和母親不同意，覺得應該設法周濟二叔渡過難關，但父親認為花錢買田天經地義。毛澤東說：“舊社會那種私有制，使兄弟間也不顧情義，我父親和二叔是堂兄弟，到買二叔那七畝田時，就只顧自己發財，什

麼勸說也聽不進去。”¹這實際上就是外部資本對農村衝擊的一個事例。

農村的凋敝，反過來使得城市工商業缺乏足夠大的市場，要麼半途夭折，要麼只能依附於外國，形成殖民地經濟結構，不能發展出獨立自主的產業體系。可見，突破小農經濟對現代化的約束，關鍵是要解決這樣一個問題：如何既有效集中農業剩餘，又避免農村受到衝擊而破產？這個問題，從晚清一直延續到現在，仍然不能說完全解決了。

國際體系的約束

除了國內小農經濟的約束，中國現代化所受的主要外部約束就是國際體系的約束。西方工業革命時，英國等第一撥實現現代化的國家，面對的還是一個以自然經濟為主的世界，有著廣闊的處女地尚未被商品經濟所覆蓋。而包括中國在內的大多數國家在啟動現代化時，面對的是已經形成的資本主義全球體系。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把全球分為兩極：一極是所謂的“中心國家”，即以歐美幾個強國為主的發達國家，在世界體系中佔據主導地位，依靠軍事、科技、文化方面的優勢，掌握著貿易主導權，控制和支配著另一極“邊緣國家”，這些國家在政治和經濟上受中心國家控制，在經濟上基本被鎖定在產業鏈低端，為發達國家提供低成本的自然資源、農產品、初級產品和勞動力。

按照自由市場經濟學理論，全球分工和自由貿易可以使所有國家受益，落後國家會不斷縮小同發達國家的差距，實現世界大同。但事實證明，工業革命以來，這種“自由貿易”實質上是工業強國鞏固自己壟斷地位的工具，除了個別經濟體之外，“中心國家”和“邊緣國家”的差距並沒有縮小，而是在擴大。自由貿易的基礎是強者的壟斷優勢，所以，自由貿易論的本質是一套強者的話語體系，它不過是強者手中一個扶強抑弱的工具，依仗壟斷性工業優勢，推動國際自由貿易，藉此構建一種牟取壟斷利益的國際結構。通過查究歷史，我們可以更清楚地認識自由貿易論的本質。事實上，在把歐洲主要國家帶入自由貿易體系之前，率先完成工業化的英國在雙邊框架內與個別國家簽訂過貿易自由協定，以自由貿易為誘餌，讓他國的生產要

1 [德] 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

2 人民網資料：1944年8月31日，《毛澤東論述新民主主義社會基礎問題》，[http://www. people. com.cn/GB/historic/0831/2835.html](http://www.people.com.cn/GB/historic/0831/2835.html)。

1 逢先知、金沖及等：《毛澤東傳（1949—1976）》，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

素更為廉價地流入英國，同時英國獲得更為廣闊的市場銷售日益積壓的產品，以達到長期壟斷工業生產的目的。例如，英國和葡萄牙曾多次簽訂互惠條約，這些條約實際上為英國產品在葡萄牙銷售打開了市場，阻礙了葡萄牙工業的發展。其結果是葡萄牙陷入對英國經濟的依附，扼殺了葡萄牙蹣跚起步的紡織工業，葡萄牙簡直成為“英國的殖民地”。同樣，英國的棉布和其他製成品洪水般湧入法國，導致法國製造業危機，引起了法國大革命。¹ 正如西方歷史學大師布羅代爾所概括的：“世界規模的分工不是平等夥伴之間協商一致的、隨時可以修改的關係，而是逐漸形成的一系列從屬關係。不平等交換製造了世界的不平衡，反過來說，世界的不平衡也製造了不平等的交換，這是古已有之的實際。”²

除了通過貿易掠奪發展中國家的資源之外，發達國家還影響了殖民地的政治和社會結構。殖民地內部往往呈現明顯的兩極分化：少量沿海和大城市交通方便，融入全球經濟，形成了一個同外部列強有密切聯繫的精英階層（即“買辦”）；但大量內陸地區仍停留在傳統社會，甚至有意保持著封建、奴隸制或部落制，因為這更有利於精英階層對底層民眾的控制。這種兩極分化，使得殖民地國家的國內市場十分有限，而且喪失了正常的治理能力，傳統社會結構也遭到破壞，強化了陷入“貧困陷阱”的命運。

舊中國是全球體系中典型的“邊緣國家”。1840—1949年，中國雖然沒有完全喪失政治主權，但是在經濟上具有典型的殖民地國家的特徵。1936年，外資掌握了中國76%的工業資本，其中包括72%的工礦和運輸業、95%的鋼鐵和石油工業、75%的採煤和電力工業、60%的紡織業、88%的鐵路、84%的航運、80%的出口貿易和90%的進口貿易。³ 與此相聯繫的，則是國內兩極分化和一盤散沙的格局。少數沿海城市，同國際經濟體系已經有密切聯繫，如“上海之所以得以發展和繁榮，主要靠的是稅收，長江流域的所有貨物貿易和航運都在課稅之列……西方人在十二平方英里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裏，像老闆那樣控制著逐漸步入工業化和商業化的中國”⁴。但是廣大內地和農村，仍然處在封建社會結構中，大多數小農既無力抵禦市場



風險的衝擊，也沒有能力進行必要的投資和消費，這反過來制約了中國的民族資本和工商資本擴大生產、提高技術，從而不可能發展出獨立自主的經濟體系。

在這種國際體系下，無論是清朝洋務派，還是後來的國民政府，均希望通過外部力量的幫助實現工業化，被迫或主動地讓大量外部投資進入中國。其結果是，雖然中國建立了一些現代工業，但是資金、技術、市場主要控制在外國資本家手中，中國民族工業並未發展起來，反而受到官僚資本和買辦資本的雙重壓制；西方廉價工業品大規模輸入，也使得中國手工業大量破產。據英國學者威廉·韓丁對當時華北的調研：

廉價的工業品大規模的輸入，使得愈來愈多的經濟部門遭到了損害。在紡織工業方面這種情況尤其顯得突出。數以百萬計的織布工人，由於無法同蘭開夏、東京以及後來上海的動力織機競爭，失去了主要的謀生手段，被拋入為那稀少的、已經貧瘠的土地而互相爭奪的人群中，這個人群一直在擴大。無地的窮人迅速增多，使地主能夠提出更苛刻的租佃條件，徵收更多的地租，抬高利率；使糧商們能夠在收穫季節壓低收購價格，而在冬、春兩季則把糧價抬高，使商人能夠擴大農產品與工業品的差價。不僅僱農和佃農，就是有地的中農也感到壓力愈來愈大。為了勉強餬口，他們必須延長勞動時間，起早貪黑，拚命幹活。即使這樣，還是難以維持生計，只好日益頻繁求助於債主。可是一旦背上了債務，便再也難以掙脫出來。在張莊，沒有欠下相當於幾年收入的債務的人家，簡直是例外。由於高利貸的盤剝，苛捐重稅的壓榨和奸商的欺騙，許多有地的農民都破產了……在許多地區，農村人民的處境，就像一個人永遠站在齊頸深的水裏，一個小浪就足以把他淹死。¹

1929年歐美經濟大蕭條之後，中國成為西方轉移危機的場所。² 大量外國白銀和廉價商品的輸入，讓中國僅有的民族工業大面積破產，而且出現了房地產泡沫。到1935年，上海已經有一千家企業倒閉，失業人數達到五十萬。這表明，在殖民地的

1 梅俊傑：《從馬克思的論斷看自由貿易的歷史真相》，《馬克思主義研究》，2009（06）。

2 [法] 費爾南·布羅代爾著，顧良、施康強譯：《〈世界的時間〉十五至十八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第三卷》，北京：商務印書館，2017。

3 遲萍萍：《淺析抗美援朝戰爭對外國在華企業的影響》，《黑龍江史志》，2010（09）。

4 [英] 理查德·休斯：《香港彼時彼地》，倫敦：安德烈·多伊奇出版社，1968。

1 [英] 威廉·韓丁：《翻身：一個中國村莊的革命紀實》，北京：北京出版社，1980。

2 嚴泉：《民國經濟史研究的新視角——讀〈大蕭條時期的中國：市場、國家與世界經濟〉》，《史學理論研究》，2013（01）。

經濟條件下，不可能發展出有效的國內需求，也無法建立起符合中國發展需要的基礎工業體系。¹

新中國成立時，雖然政治上獲得了獨立，但依附性的殖民地經濟結構尚未改變。中國面臨著艱難的選擇，是繼續走依附大國的道路，還是堅持建立獨立自主的經濟體系。在考察了國內、國際形勢之後，為了儘快改變舊中國重工業嚴重落後的狀況，中國實行了優先發展重工業和軍事工業的戰略，主要依靠國內資源進行積累，經濟發展不能以經濟效率為唯一目標，還要儘快滿足國家安全的需要。

國家能力的約束

近代以來，不管是什麼國家，政權在現代化過程中都起著不可或缺的作用。資產階級革命初期，資產階級依靠國家暴力打破封建束縛，把土地和勞動力變成可以自由買賣的商品，為工業化創造了條件。德國、日本等實行國家資本主義，通過國家力量集中資源，優先發展重工業和軍事工業。二戰之後，資本主義國家在提供公共產品、社會保障、調節收入分配等方面的作用也增強了，這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兩極分化等社會矛盾和風險。

要啟動現代化必須要有一個強有力的國家政權。陷入貧困陷阱的國家，往往缺乏國家治理能力，其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國家軟弱渙散，沒有能力維護社會穩定、提供公共產品、實施長遠的經濟社會發展計劃；二是國家政權被特殊利益集團所控制，變成個別集團謀利的工具，導致大多數人喪失發展的機會。這兩種國家，都不可能順利實現現代化。而這兩個問題，在舊中國都存在。

一方面，封建社會時期中國的政府是弱政府。其社會政治結構的特點是“皇權不下縣”，基層以地主士紳主導的自治為主。為了維護這種結構的穩定，防止苛捐雜稅導致民變，中央政府只好有意犧牲財政能力，使得封建社會財政的規模未超過GDP的4%。清朝中葉之後，地方勢力做大，中央權威迅速銷蝕。據估計，19世紀後期，政府收入總額約佔GDP的7.5%，而中央政府所得的份額僅為3%。²

“弱政府”崇尚“簡政”，依靠“鄉賢”，提倡地方自治，這種弱化國家能力、

1 代春霞：《20世紀30年代世界經濟蕭條影響下的中資銀行業研究》，天津：南開大學，2012。

2 馬敏：《現代化的“中國道路”》，《新化文摘》，2017（3）。

依靠地方自治的傳統，有效維護了封建制度的穩定。直到近代，蔣介石仍然在他的《中國之命運》裏推崇這一傳統，他認為：

中國固有的社會組織……其自治的精神，可以修齊舉的實效，而不待法令的干涉。其互助的道德，可以謀公眾的福利，而不待政府的督促。……五千年來……社會的風氣仍能精誠篤實，勤苦儉樸，崇禮尚義，明廉知恥，我們中華民族所以能久於世界，此實為其基本原因。¹

蔣介石看到了鄉村地方自治對於穩定農村的作用，但他沒看到這種穩定是一種消極的辦法。這種穩定使農村長期保持自給自足的生活方式，無力集中資源實現技術進步，造成了封建社會的停滯。一旦進入工業化、城鎮化時代，政府將無力保護農民，在工商資本和金融資本的衝擊下，農村土地兼并加劇，豪強地主和新興的工商資本相結合，對農民的盤剝更加嚴重。而國民黨政府並沒有把土地問題和農村政權建設提上日程，這是其失敗的重要原因。

另一方面，國民黨政權帶有鮮明的政治依附性。蔣介石主要的權力基礎是壟斷資本集團及其背後的國際資本，這就決定了國民黨政權不可能代表農民、工人和民族資產階級的利益，而只能代表大資產階級、買辦資產階級的利益，從而不可能認真實行土地改革、減租減息等有利於社會公平、改善底層人民生活的措施，也就不可能打破土地食利者、高利貸食利者對資源的攫取。國民黨統治時期，雖然苛捐雜稅多如牛毛，農民的負擔重，但是其稅賦真正進入國家財政的卻十分有限。四川一份調查推測，保甲長把1/3的攤派金裝入了自己的腰包。1945年初《大公報》記載，農民的負擔五倍於政府下達的稅負，中間差額就被地主豪強拿去了。²

土地和金融食利者階層的存在（國民黨自身也是這個利益集團的一部分），使得農業生產有限的剩餘無法集中到實業部門。1936年，國民黨政府的預算僅佔GDP的8.8%，是一個十分典型的弱政府。政府治理能力低下，國民黨為了打仗不得不藉助美援、印鈔票，結果損害了從中產階級到農民的各個階層的利益，這注定了國民

1 李玲、江宇：《有為政府、有效市場、有機社會——中國道路與國家治理現代化》，《經濟導刊》，2014（04）。

2 [美] 易勞逸：《毀滅的種子：戰爭與革命中的國民黨中國》，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9：51。

黨失敗的下場。從這個意義上說，國民黨敗在利益集團林立、基層社會潰敗和國家治理能力缺失。而與此同時，中國共產黨在根據地和解放區進行土地改革，把過去由利益集團攫取的資源分配給農民，既贏得了人民的擁護，又具備了強大的資源動員能力。因此，國共兩黨關於中國命運的決戰，實際上也是兩種經濟發展路線、兩種階級力量的決戰。

可見，小農經濟的約束，封建主義的強大，使得中國內部的資本主義力量十分弱小。與此同時，外部世界資本主義的發展，也遏制著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獨立發展。外有帝國主義，內有封建勢力，成為遏制中國實現現代化的兩種力量。對苦難時代的中國人來說，資本主義是一把雙刃劍，“既怕他不來，又怕他亂來”。中國一方面苦於外部資本主義的發展，即帝國主義的侵略；另一方面又苦於內部資本主義的不發展，即封建壓迫。“反帝反封建”就是對“兩個苦於”的回應，今天中國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同樣是對“兩個苦於”的回應。¹

中國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壓迫下進行反帝、反封建的鬥爭，需要一個強有力的政權。清政府和國民黨政府並不能代表被壓迫人民的利益，資產階級政權不能使中國人民獲得獨立自主發展空間，更不可能有效集中資源啟動現代化進程。這就決定了，中國要實現現代化，只能走不同於資本主義的新道路。舊中國的政治經濟模式不可能承擔起啟動現代化建設的任務。中國要啟動現代化進程，實現真實的經濟增長，首先要回答三個問題：第一，如何在小農經濟基礎上有效積累資本，既完成工業化的原始積累，又維護農村的穩定和發展？第二，如何實現獨立自主的發展，擺脫作為“邊緣國家”的依附地位，既利用必要的國際援助，又防止喪失經濟獨立性？第三，如何提高國家治理能力，構建一個強有力的、能夠打破利益集團、啟動現代化進程的現代國家？

中國走上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道路，正是對這幾個問題的回答。

1 秦益成：《如何對待資本主義：中國近現代史的基本問題——兼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歷史必然性》，《紅旗文稿》，2009（19）。



2. 新中國現代化的目標和約束

新中國成立後，中國共產黨立即面臨著對經濟發展道路的選擇，這不僅要考慮經濟效率，還要滿足維護國家安全和獨立、奠定重工業基礎、改善民生三個方面的要求，而要同時滿足這些要求，就需要制定一套不同以往的經濟發展戰略，找到一條前人沒走過的符合當時中國國情的經濟發展道路。

中國現代化起步時的三大目標

第一個目標，維護國家安全和獨立。新中國成立初期，面臨著嚴峻的國際形勢。二戰後，美國與蘇聯等大國劃分了勢力範圍，形成了核壟斷。中國地處兩大陣營對峙前沿，“台灣問題”尚未解決，東部沿海面臨著美國的威脅，20世紀60年代之後北方又面臨著中蘇關係的破裂。為了維護國家安全，必須先建成國防工業體系，獲得基本安全保障，才能開展一切經濟活動，也才能在比較平等的基礎上進行對外開放。這就決定了，50、60年代的經濟發展帶有“戰時經濟”的性質，重工業優先發展、計劃經濟、三線建設、農業集體化等重大經濟舉措，都同應對戰爭威脅有直接關係。直到20世紀70年代中國擁有了“兩彈一星”，初步建立了完整的工業體系，實現石油等戰略物資自給，具備了同超級大國博弈的能力之後，才獲得了一定的安全保障，從而有條件調整經濟發展戰略。

第二個目標，奠定現代化所必需的工業基礎。工業化是現代化最主要的特徵之一。但啟動工業化進程和做大經濟總量，是兩個不同的概念。清朝乾隆時期，中國GDP佔世界的1/3，但仍是一個典型的農業社會。晚清政府和國民黨政府都曾努力啟動現代化，但是並沒有具備現代化所必要的起碼產業基礎。新中國成立時，經濟是極端落後的。現代經濟成分只佔GDP的1/10左右，1950年中國人均GDP不到五十美元；按照1952年的人民幣價格，當時中國人均固定資產不足四十元¹，難以形成有效投資。到1952年，雖然工業有了一定發展，但是工農業總產值中現代工業產

1 方燁、張曉芳、胡鞍鋼：《60年經濟發展讓中國走向世界強國》，《經濟參考報》，2009-09-03。



值只佔 26.6%，重工業在工業生產總值中佔 35.5%；輕工業主要是紡織、食品加工等作坊式工業。每年人均發電量 7.9 度，還不夠一盞日光燈照明；人均原油產量 0.36 公斤，只夠開幾公里汽車；人均鋼產量 0.29 公斤，不夠打一把菜刀。在這種情況下，要啟動現代化，必須要對落後的經濟結構進行根本的改造，而要具備產業基礎特別是重工業基礎，需要大量的基礎投資，首先要解決如何在一個農業社會的基礎上積累資本的問題。

第三個目標，改善民生和促進人類發展。人類自身的發展，既是現代化的目標，也是經濟增長的動力。舊中國人力資本水平極低。1949 年，全國人口中 80% 以上是文盲，學齡兒童入學率僅 20%，人均預期壽命三十五歲左右，嬰兒死亡率超過 20%，這些指標相當於西歐 1820 年的水平，國民精神萎靡不振，社會一盤散沙，被稱為“東亞病夫”。這種狀況，不可能產生一支合格的產業工人隊伍，也影響著整個國家的活力和精神面貌。解放戰爭後期，國統區惡性通貨膨脹使得民生維艱，國民黨喪失人心。新中國成立之後，中國共產黨帶領全國人民在一窮二白的基礎上，既要應對國內外的安全威脅，又要啟動現代化工業建設，還要不斷改善人民生活，經濟發展的難度可想而知。

國家安全、工業化和改善人民生活這三個目標都具有“一票否決”的性質，哪一個都必須實現。正如毛澤東 1951 年 10 月 5 日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所說的那樣：“戰爭必須勝利，物價不許波動，生產仍須發展。”¹ 要兼顧這三方面的目標，中國的經濟建設就不能僅僅追求增長速度，而是必須找到能夠兼顧三方面目標的發展道路。

因為沒有意識到這三個目標之間相輔相成、不可分割的關係，中國近代探索現代化道路的各種嘗試都失敗了。洋務運動興辦實業，試圖以經濟振興實現民族獨立，國民黨政府過度依賴外資促進經濟增長，導致重要的資源和基礎工業部門喪失獨立性，使得中國成為國際體系中典型的依附性國家、邊緣國家。中國經濟雖然獲得了一定的增長，卻是以喪失經濟和政治主權為代價的。此外，1840 年以來，中國現代化進程多次中斷，除了外敵入侵之外，還有一個關鍵的原因，就是沒有解決好民生問題，由於工商業資本過度盤剝小農，造成小手工業者破產，農村經濟停滯

不前。

新中國成立時，世界上已經存在的現代化道路，也都不適合中國。

首先，中國不能走英、德、日等資本主義國家的現代化道路。英國等早期資本主義國家，靠殖民和海外貿易獲得原始積累和市場。在國內通過圈地運動，強行把農民和土地分離，獲得廉價的勞動力；在國外通過對外殖民，獲得廉價的奴隸、原料以及產品市場。據美國黑人學者杜波依斯的估計，從 16 世紀開始的三百年歷史中，歐洲和美洲國家從非洲販賣的奴隸達到六千萬，使非洲人口佔世界的比例從 1/5 下降到 1/13，正是依靠這些奴隸的勞動完成了工業化的原始積累。¹ 很顯然，這種道路，中國沒有條件走也不能走。德國和日本等後起的資本主義國家，靠戰爭賠款和殖民獲得原始積累和市場，中國也無法效仿。

其次，中國也不能走以“亞洲四小龍”為代表的小經濟體的發展道路，靠依附大國獲得安全和市場。有觀點認為，中國如果像“亞洲四小龍”那樣，加入全球貿易體系，承接西方產業轉移，從事勞動密集型的加工工業和貿易，發揮勞動力密集的比較優勢，那麼也會和它們一樣，早日實現現代化。這種看法是錯誤的。“亞洲四小龍”的騰飛有一個共同的前提，即它們加入了以美國為首的西方政治經濟體系，獲得了西方國家的市場、技術和資金支持，這是一種依附型發展道路。這條路對小型經濟體是可以的，對中國這樣的大國並不適用：一方面，中國不可能放棄來之不易的獨立和解放；另一方面，西方國家支持幾個小經濟體作為“不沉的航空母艦”是能夠負擔得起的，但是任何國家都沒有能力像支持“亞洲四小龍”那樣支持中國，也不敢像扶持“亞洲四小龍”一樣扶持中國。

總之，中國既不能複製英、德、日等資本主義國家的發展模式，也不能模仿“亞洲四小龍”等小經濟體的發展道路。也就是說，當時已經實現工業化、現代化的國家的發展模式，都不適用於中國。不管是自己國家的老路，還是別人的老路都走不通，一窮二白、百廢待興的新中國只能尋找一條新的發展道路。



1 融冰：《新中國成立初期的增產節約和反浪費運動》，《黨史博覽》，2015（5）。

1 黃紹湘：《美國通史簡編》，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23。

在看到這些困難的同時，還要看到的是，新中國之所以能夠超越舊中國，是因為新中國成立時已具備了一些獨特的優勢。具體地說，是三個以前並不具備的優勢。

第一，中國大陸實現了完全統一，形成了具有龐大人口的統一市場。人是生產力最活躍的因素。新中國的成立，結束了一百多年來的封建割據和軍閥混戰局面，使全國形成了統一的巨大市場，具有規模優勢。只要採取適當的發展戰略，就能夠只依靠本國的資源和人口，建成比較完整的產業體系，形成巨大的國內需求，而並不依賴國際市場，也不怕被封鎖，從而有可能逃脫邊緣國家走依附道路的宿命，這是中國作為大國的獨特優勢。

第二，中國進行了歷史上最徹底的社會革命，構建了一個公平和團結的社會。舊中國難以啟動工業化，一個重要的原因是食利階層對農村剩餘資源的攫取，這些食利階層既包括國外的（帝國主義）也包括國內的（官僚資本主義和封建主義），導致國內的財富外流或者積聚成為奢侈性消費，但是並沒有轉化成實業，也沒有惠及大多數人群。中國共產黨領導了中國歷史上最徹底的，也是世界歷史上少有的社會革命，打破了當時的各種利益集團，營造了一個公平的社會，將過去由少數群體所佔有的財富釋放出來，用於工業化的投資和改善民生。同時，一個公平的社會，也有利於全民族教育文化素質的普遍提高，有利於社會團結和共識形成。這些都是社會革命對經濟增長的正面意義。

第三，中國共產黨具有嚴密高效的組織能力。從農業社會進入工業社會的過程，就是社會生產組織化程度提高的過程。中國共產黨是一個具有嚴密組織體系和崇高威望的政黨，依靠黨的組織動員能力，可以彌補中國作為傳統發展中國家的政府能力低下以及市場發育不足的問題，保障了國家的安全和穩定，把有限的資源集中到對長遠發展最有效的領域。

這些條件使新中國具有了啟動現代化建設的潛在的可能性。要真正利用這些條件，找到適合中國的現代化道路，還要經過反覆的實踐和探索。新中國成立初期所遇到的第一次經濟危機“四月危機”，對新生的政權是一個很好的教益。這次危機證明了，舊中國遺留下來的經濟制度不可能承擔起社會主義中國建設和發展現代化的任務，從而促使中國共產黨從解決這次危機入手，尋找啟動中國現代化的正確道路。



▶▶▶ 3. “四月危機”：舊制度和新目標的衝突

新中國成立前夕和成立之初，中國共產黨的主要領導人曾多次表示，在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之後，不可能馬上進行社會主義革命，而要先經過新民主主義的過渡階段。可是，新中國成立剛三年，毛澤東即提出要由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並只用了三年時間就完成了這個過渡。究竟是什麼原因，或者說究竟出現了什麼新情況，使中國共產黨縮短了原來設想的新民主主義經濟道路，而提前進行了社會主義改造？有人認為，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實行的就是當年的新民主主義道路，如果當時不那麼早進行社會主義改造，中國經濟可以“少耽誤二十年”。

認為中國進行社會主義改造是“搶跑”的觀點，缺乏歷史依據。實際上，無論是依靠舊中國的經濟制度，還是設想中的新民主主義政策，都不可能啟動現代化。這個結論是在新中國成立初期一系列實踐中得出的，其中，最早的一次就是1950年發生的“四月危機”。

“四月危機”

1950年4月，新中國遇到了第一次經濟危機。表面上，這次危機是治理國民黨統治造成的通貨膨脹帶來的後果。

1949年初，隨著解放戰爭進入尾聲，國民黨統治下的城市地區出現了嚴重的通貨膨脹和投機行為。新中國成立以後，經濟工作的主要任務是平抑物價、打擊投機。1950年3月，中央採取制止通貨膨脹的有力措施之後，物價趨於穩定，但私營工商業的生產經營出現嚴重困難，普遍出現商品滯銷的情況。1950年4月，全國出現了市場蕭條、工廠倒閉、工人失業增多等新的經濟困難，影響到社會人心的安定，民族資產階級更是惶惶不可終日，以上海為例，4月的棉紗、米、麵粉交易量分別只有1月的53%、17%、56%。¹當時有人寫了一副對聯：“掛紅旗五心不定，扭秧歌進退兩難”，反映了私營工商業者的心境。這便是“四月危機”。

¹ 上海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上海資本主義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